

革新公共事業專營制度 確保惠及社會長遠利益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自19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全球範圍內興起。其核心理念是通過市場化手段削弱政府的過度干預，使資源分配更為高效。以電力、煤氣、公共交通等公共事業為例，這些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緩解了政府財政負擔，同時引入了競爭機制，提高了行業效率。與傳統由政府全盤控制的模式相比，市場化能減少財政負擔，並通過價格槓桿確保供需平衡。此外，市場化改革為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引入了更多資本，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支持。

保持市場活力 兼顧社會責任

儘管公共事業市場化改善了效率，但其弊端同樣顯著。首先，私營壟斷的問題十分突出。由於部分公共事業具有天然壟斷性，比如電力網絡建設成本高昂，市場往往形成由少數企業控制的局面。企業在缺乏充足競爭壓力下，服務質素較難長期維持，市民也較缺乏議價空間。其次，市場化重視資本利益，企業可能忽視社會責任，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會通過提高價格、減少設施投資等手段壓縮成本，形成「用高價換服務」的局面。同時，涉及能源、電訊等關鍵領域的資本滲透，還可能威脅國家或城市經濟安全和公共利益。因此，市場化的推進應結合有效的政府監管，保證其既能發揮市場的活力，又不損害民生和安全。

全球範圍內，因私營資本過度攫取利益或引發社會矛盾的案例不勝枚舉，不少國家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探索。例如，在電力工業領域，英國在1989年通過了《電力法》，明確要求發電業務與輸配電分離，並打破區域性壟斷，引導更多競爭主體進入市場。通過獨立監管機構對價格與市場行為加以約束，有效平衡了市場化帶來的效率與壟斷問題。又如美國1992年頒布的《能源政策法》，加強了電力市場的競爭性，明確了發電、輸電及售電三大環節的分離，其中強調開放州際輸電網絡，

在香港，經營公共事業（如電力、公共交通等）的機構，都需要取得特區政府批出的專營權。這一模式曾在推動本港經濟繁榮和提供高效服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其背後的弊端近年亦開始浮現。在英美等國對公共事業專營制度進行深度改革、明確市場與公共責任界限，並強化政府在關鍵領域作用的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更需與國際接軌。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正好可以利用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契機，研究改革現行的專營制度，推動公共事業更好地服務市民，保障社會安全同時增強經濟韌性。

讓更多市場主體共用網絡資源。然而，英美的改革過程中亦暴露過度市場化的問題，例如成本轉嫁消費者以及監管不足引發的危機，突出監管機制的脆弱性。

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制的代表，其公共事業領域一直憑藉專營權政策，平衡市場化與公共利益。香港的公共事業專營權制度在過去數十年中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穩定且高效的服務。例如，香港的電力供應穩定性居世界前列，而公共交通體系也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市場化鼓勵私營企業積極投資和技術升級，是成效顯著的重要原因。

然而，現有體制亦存在隱患。一是由於「准許回報機制」與資產掛鉤，導致企業以過度投資獲取更高收益，結果是市民承擔了額外成本。二是市場供給資訊的不透明，讓市民始終處於弱勢，即便有價格聽證會制度，對漲價的遏制作用也相對有限。三是體現在服務可持續性不足，現行專營權合同更多關注於企業利益，較少涉及長期公共目標。四是公共事業沒有完全配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在戰略安全和運作主權方面存在風險隱患。例如，部分基礎設施需進一步確保由特區政府或國家資本控股，以消除外資對本地供應鏈的潛在控制，避免對國家安全與關鍵服務造成威脅。

維護國家和社會安全

針對這些問題，正在編制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亟需與時俱進，探討改革專營制度，更好地體現「改善民生、政府主導、維護安全」的三大特徵。這不僅是回應市民期望的積極舉措，也是確保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其一，改善民生應成為改革的核心目標。當前，專營制度在滿足企業收益的同時，容易增加市民的經濟負擔。特區政府應重新審視制度機制，通過優化資源分配，確保公共事業更直接地惠及廣大市民。同時，加強資訊透明化與公眾參與，讓服務價格和

決策更加公開、公平，從而切實提升市民的生活質量。

其二，改革需要更加突出特區政府的主導作用。在現有專營制度中，監管效果和執行力仍有提升空間。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強化自身在改革中的角色，通過健全監管體系與規則設計，推動相關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同時，特區政府可以在市場結構中優化供給機制，平衡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確保公共事業更符合長期社會發展目標。

其三，改革必須將維護國家和社會安全作為基本前提。公共事業直接關係到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尤其是涉及戰略性行業領域。特區政府應加強對關鍵領域的監管和保障，避免外部勢力干擾和侵蝕本地市場。同時，改革需同步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提升基礎設施的自給能力與韌性，從而增強社會面對複雜環境下的獨立性和抗風險能力。

更好對接內地公共事業網絡

其四，在涉及北部都會區和河套地區的建設當中，改革公共事業專營制度具有關鍵意義。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區域，這些地區的發展不僅需要高效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同時也承載着與包括深圳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聯動發展的使命。通過改革公共事業制度，可以進一步打破地區之間的服務壁壘，提升跨區域資源的協同效益，確保電力、交通、水務等公共事業網絡與大灣區整體發展規劃更緊密銜接。這種聯動不僅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撐，也能助推香港在國家重大戰略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公共事業專營權的優劣勢隨着社會環境的變遷不斷顯現。新形勢下，民生福祉與經濟安全更應成為香港由治及興的首要目標。香港五年規劃將是歷史性開端，對專營制度進行持續改革，有望緩解當前矛盾，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公平的服務體系，確保香港在區域競爭中繼續保持優勢。

完善擇業引導 推動青年人才投身創科

管浩鳴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近期，香港正處於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將人工智能（AI）、算力中心、數據科學及生命健康科技等高質量發展產業，定位為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然而，產業藍圖繪製得再宏偉，若缺乏相匹配的頂尖人才投入，轉型終將面臨「有車無人開」的困境。

日前，中學文憑試放榜，產生的25位狀元中，有22位最終選擇留港修讀醫科。雖然狀元集體「擇醫而棲」並非新概念，但在經濟轉型的急迫背景下，這種現象值得關注。

事業取向要追上時代所需

頂尖學子湧向醫療領域，究竟是因為他們不看好新興產業的前景，還是他們沒有真正理解未來的經濟走向？當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算力發展與AI重塑產業結構時，本地最優秀的青年卻普遍對這些高科技領域抱持觀望或陌生態度。然而，我們的社會生態在變，家長與學生對未來事業的取向也應追上時代。

醫科代表着清晰的升遷路徑、優渥且穩定的薪酬體系，以及明確的專業門檻；相比之下，創科與高科技產業則伴隨着較高的不確定性與市場風險。然而，如果全港最優秀的學生幾乎清一色選擇傳統專業，經濟轉型後的高端人才儲備究竟從何而來？引入境外人才固然能解燃眉之急，但若本地人才培訓體系無法源源不絕地為新興產業輸送中流砥柱，香港的創科生態便難以真正根深葉茂。

特區政府並非沒有察覺人才培訓的重要性。特區政府近期提出把僱員再培訓局易名為「技能提升局」，旨在提供包括AI應用在內的

各類「技能為本」培訓，全面提升本地勞動人口的競爭力，相關條例草案正由立法會審議中。此舉在職能再培訓與提升中基層勞動力生產力方面固然值得肯定，但若從整個產業轉型的高度審視，僅靠在職培訓與技能升級是否足夠？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培養領軍型科技人才

僱員再培訓局的定位偏向「應用型」與「修補型」，解決的是既有勞動力的工具轉型問題；但要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前沿技術突破，香港更需要的是具備原始創新能力、系統性思考與國際視野的「領軍型」頂尖人才。要打破當前人才培育與經濟轉型脫節的僵局，特區政府與教育界必須進行深遠變革，包括重塑頂尖科技人才的價值期望與職涯前景。

特區政府與產業園需共同建立清晰的創科產業職涯梯隊，大幅提升前沿科技研發者的社會地位與薪酬待遇，從根本上扭轉「唯有讀醫才是最佳出路」的單一社會價值觀。長遠而言，特區政府需要深化中學與大學的教育銜接。目前的基礎教育體系仍過於偏重傳統應試範疇，學生對AI、數據科學等新興領域的認識多停留在基本層面，缺乏對產業前景的深刻理解。特區政府應引導大學與中學建立常態化的機制，讓優秀學子在選科前便能掌握產業發展的脈搏。

經濟轉型是一場系統性的變革，而教育正是這場變革最基本的支撐。當前狀況擇業的集體取向，正是社會對轉型信心與認知的一面明鏡。特區政府在規劃產業政策、撥款發展算力與AI的同時，更須重新思考整體教育與人才培訓戰略，讓本港最優秀的人才願意投入創科，支撐起香港未來的轉型之路。

凝聚眾志眾力繪藍圖 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楊莉珊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為期兩個月的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期日前結束。這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也是特區政府首次以「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性文件，為未來五年發展錨定方向。諮詢期間，社會各界踴躍參與、熱烈建言，最終特區政府收到逾16,000份意見或建議。

今次香港五年規劃囊括產業發展、民生福利、青年機遇、大灣區融合、城市建設等與全港市民有切身利益的議題，打破了界別與群體壁壘。立法會更成立「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在短短一個月內舉辦99場諮詢會，接觸社會各界超過4,000人次，累計收集意見及建議書570份。這組數字背後，是香港社會對這份規劃的重視與期盼。

行政立法高效配合

今次諮詢最令人欣慰的，是社會各界沒有流於形式化的讚許或空泛的呼籲，而是直指香港當前的發展瓶頸，針對性提出可行建議。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發文，坦言十分重視地區諮詢會，認為這是了解市民最關切議題的重要渠道。他表示，從市民的踴躍建言中「感受到市民很熱愛香港，很多意見內容反映出市民對香港的未來有信心、持正面態度」。集中力量辦大事，同時讓微觀訴求優化宏觀藍圖，正是行政主導優勢的生動體現。更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與立法會成立了協同機制，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在5月29日向行政長官提交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協助推進規劃編制，標誌着行政與立法良性互動邁上新台階。

諮詢收官，意味着規劃編制進入最後衝刺。李家超已明確表示，香

港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一脈相連，兩者公布相距時間愈短愈好，爭取第三季內公布正式規劃。這種「規劃引領、施政報告對接落實」的安排，確保了政策連續性與可操作性。

以民為本 開闢新局

面向未來，香港必須凝聚眾志、集眾力、開新局。

聚眾志，就是整合全港社會的發展共識。李家超將「以民為本，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列為香港五年規劃三大策略方向之首。這一定調，讓規劃有了鮮明的民生底色。只有規劃內容真正回應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市民最切身的訴求，才能讓市民切實感受到發展紅利。

集眾力，就是打破界別隔閡、匯聚各方資源。三大策略方向中，第二條即是「更好地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帶來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對青年和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的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和向上流動的空間；對整體社會而言，規劃能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

開新局，就是以科學規劃為引領，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助力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民意所指就是施政所向，民心所盼就是發展所向。」這不僅是今次諮詢的最生動寫照，更應成為未來五年特區政府施政的根本遵循。隨着香港五年規劃正式落地，全港社會只要同心同向、攜手並進，必能破解發展難題、釋放城市潛力。在「一國兩制」的堅實保障下，在香港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同頻共振的歷史機遇中，這份凝聚全港智慧的五​​年規劃，必將開創香港長治久安、繁榮進步的全新局面。

日本扭曲歷史觀 意圖復辟軍國主義

何志平



今年是日本在二戰無條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致辭中，隻字未提日本當年對鄰國發動侵略戰爭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災難。她迴避歷史反省、淡化戰爭責任、否認罪責，且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禮費，以場外遙拜的「實質支持」配合日本多位現任閣僚及自民黨核心領導層的現場集體參拜，政治挑釁意味極濃，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對與譴責。以高市為典型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正將扭曲的歷史觀帶入國家決策層，妄圖推動軍國主義借屍還魂，加速再軍事化，突破「專守防衛」限制，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高市早苗過往是靖國神社的常客，在當選首相前，每年8月15日她都會前往參拜。她多次質疑「河野談話」之真實性，否認日軍在「慰安婦」問題上存在強徵行為，將之歪曲為「商業行為」。高市早苗又主張建立「國防軍」，徹底擺脫「戰後體制」，圖謀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她曾在著作中暗示所謂「大東亞戰爭」具有「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積極意義，與日本右翼長期宣揚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脈相承。儘管其錯誤言論及行為引發侵略受害國強烈抗議和日本國內反對，但她依然不管不顧、一意孤行。

高市早苗更是日本「歷史認知倒掛」現象的代表性人物。二戰後，日本社會從未真正清理軍國主義餘毒，長期為侵略歷史「塗脂抹粉」，近現代史等基礎教育在日本被長期邊緣化，中小學的歷史課本對當年日本入侵他國、屠殺他國人民等泯滅人性的殘暴罪責避而不談。這種掩蓋歷史事實的做法，使學生普遍缺乏對戰爭責任的深刻認識，為日後接

受右翼史觀埋下伏筆。

高市早苗能從普通閣員做到一國首相，正是通過迎合日本社會右翼訴求來鞏固政治資本。其扭曲的個人歷史觀亦隨之滲入權力核心，長期毒化輿論場。是次供奉，既是右翼政客又一次錯誤史觀的肆意作祟，更凸顯了其背後政治勢力的蓄意圖謀。

「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

高市早苗上台以來，加緊將右翼史觀轉化為一系列挑釁之舉，蠶食和平憲法的根基。從炮製「台灣有事」謬論，到在臨近台灣的西南諸島部署中遠程導彈；從大幅加碼防衛預算，到在《馬關條約》簽訂之日遣艦過航台灣海域；從全面解禁武器出口，到打造「日本軍工株式會社」；從強化國家情報體制，到擴充軍備、積極開展軍售外交等，高市早苗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名，打着「正常化」幌子，突破戰後體制束縛並持續強化軍事力量，全面構建一套完整的新型戰爭準備體系，本質上就是軍國主義思想在當代的復辟與變種，「新型軍國主義」正成為衝擊地區和平穩定的現實力量。

「新型軍國主義」與舊軍國主義從思想根源和政治驅動力上衣鉢相傳，都是崇尚強軍擴張、迷戀以武力解決爭端。有學者將高市早苗「綜合情報、嚴控輿論、解禁軍備、擴張軍備」等動作，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路徑相比對，得出二者「高度重回」結論。但細加剖析，舊軍國主義以公開的軍事擴張和領土侵略為特徵，而「新型軍國主義」則更具隱蔽性和系統性，憑藉軍民兩用技術的掩護，以「經濟安全保障」「網絡安全」「太空開發」等現代話語包裝軍力擴張意圖，並依賴軍工複合體與政治集團的利益綑綁，推動「修憲—

擴軍」利益閉環，而非公開的侵略狂熱。這種戰略意圖遮掩化、擴軍路徑漸進式化、法理突破隱蔽化、軍工手段利益綑綁化及對外包裝國際化的滲透方式，正是其最大危險所在。

興風作浪一錯再錯

日本政府在2025年至2026年間加速推進再軍事化，其動作之頻、性質之重遠超戰後任何時期。

一是輿論化，透過文化滲透與宣傳、篡改歷史，美化侵略戰爭。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採用動漫作封面，日本政府又製作多語種短視頻，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麻痹；文體領域則出現供奉侵略者神社、使用軍國主義符號等場面，如運動員手持二戰戰犯圖片合影。

二是法理化，推動修憲與鬆綁法律，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欲剷除「不保有戰力」條款；修改相關軍銜制度；修訂「安保三文件」，構建舉國戰爭動員體制；修改「無核」三原則，謀求「核共用」。

三是制度化，軍事預算與裝備擴張。2026財年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圓，十年間近乎翻倍，連續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扶持軍工嵌入經濟體系。

四是常態化，意味着其再軍事化行動是層層遞進、有序的、不間斷的、制度化的不可逆轉之存在。日本在台灣海峽、南海及西太平洋等多個海域頻繁派遣軍艦，介入美菲聯合軍演，試圖通過此類行動場景擴大軍事觸角、衝擊邊界，最終實現軍事大國化。

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是一個真實而緊迫的現實危機。高市早苗用心之險惡、立場之頑固，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與堅決反對。如果日本右翼政客繼續肆意挑釁，企圖復辟軍國主義，他們必然付出更慘痛的代價。